

哲学何以具有思想力^{*}

孙正聿

内容提要 哲学之所以具有思想力,主要是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具有深厚的文明史内涵,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把握和洞察自己的时代;二是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内涵,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去审度和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问题;三是具有巨大的逻辑力量,以“术语的革命”和理论的“彻底性”而变革人们的基本观念;四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对既有文明的“否定的理解”中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哲学的思想力之所在,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之所在。

关键词 哲学 思想力 文明内涵 时代内涵 批判精神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以关于时代的真理而规范和引导人类思想和行为,进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并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这是哲学的思想力之所在,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取向和历史使命之所在。

哲学思想的“文明内涵”

思想力,首先是以某种“背景知识”和“概念框架”去把握现实和研究问题的“洞察力”。用什么样的背景知识和概念框架把握现实和研究问题,直接决定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思想总结和理论升华,都具有其深厚的和深刻的文明内涵。哲学的思想力,首先是以其深厚的和深刻的文明内涵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在系统总结和深切反思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地提出,所谓的

“辩证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①。

哲学的理论思维具有深厚的和深刻的文明内涵。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时,恩格斯就特别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最宏伟的形式总结了全部哲学发展,是二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黑格尔的每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力量就在于它的“巨大的历史感”。同样,列宁也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因而他才能把世界理解为描述为一个过程,从而形成了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诉诸黑格尔的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正是在人的精神历程、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哲学的概念发展的“三者一致”中,构筑了理论形态的“现实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项目编号:17JJD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自我意识”——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关于时代的真理”。黑格尔的“关于时代的真理”深层地蕴含了他对文明史的思想总结和理论升华,具有深厚的和深刻的文明内涵。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思想内涵,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深层地则取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存在。离开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把握,哲学思想的文明内涵就失去了真实基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就在于马克思不是以“抽象的人”而是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人的历史活动”所构成的“人的历史形态”去看待人类的文明史,构成了超越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历史的内涵逻辑”,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最为真实的文明内涵,展现出最为真实的哲学思想力量。

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从宏阔的文明史视野,将其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三大历史形态。^②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不仅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内涵,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的历史任务。哲学的思想力,首先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的历史形态的文明内涵。从整个哲学史看,正是以表征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及其文明史内涵为使命,哲学经历了从表征“人的依赖关系”的“确立神圣形象”,到表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揭露神圣形象”,再到表征“人的自由个性”的“揭露非神圣形象”的历史演进。对于表征人的历史形态及其文明内涵的哲学史,马克思作出如下的精辟论断:“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③这既是马克思以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及其文明史内涵为基础所描述的哲学史,也是马克思以哲学史的文明内

涵为根据所提出的哲学使命。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在哲学的思想性的历史中,不仅承载着文明的历史性内涵,而且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的“思想力”,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的具有文明史内涵的“概念”“范畴”“理念”,为人类扩展和深化对“世界”的理解,提供了新的“阶梯”和“支撑点”。这个“阶梯”和“支撑点”,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对文明史的思想总结和理论升华,离开把握现实和研究问题的“阶梯”和“支撑点”,把哲学当作“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议题上的刻板公式”、“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这样的哲学就只能是恩格斯尖锐批评的“坏的时髦哲学”^④,因此也就失去了哲学的思想力。

哲学思想的“时代内涵”

思想力,是穿透现实的表象和问题的迷雾的洞察力。具有思想力的哲学,总是形成于两个基本向度的统一,即“向上的兼容性”与“时代的容涵性”的统一。

“向上的兼容性”即哲学的“文明内涵”,是以巨大的历史尺度和恢宏的历史内容去观照哲学所面向的时代。“时代的容涵性”即哲学的“时代内涵”,则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去审度时代的重大问题。哲学的“文明内涵”规范着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现实的本质和趋势,哲学的“时代内涵”则规范着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哲学的“文明内涵”由于其“时代内涵”而获得把握和表征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哲学的“时代内涵”则由于其“文明内涵”而获得把握和表征时代的力度和深度。离开“文明内涵”的“时代内涵”,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浅薄的、时髦的赝品;离开“时代内涵”的“文明内涵”,也只能是一种繁琐的、经院的、教条的说教。只有以“文明内涵”奠基“时代内涵”而又以“时代内涵”活化“文明内涵”,哲学才能既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才

能真正地、真实地显示其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思想力”。

在评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时,马克思指出,这个思辨的哲学体系有三个因素:一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二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三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那么,为什么黑格尔把“自然”“精神”和“现实的人”神秘化地描述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述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⑤。这表明,黑格尔的“思辨”和“抽象”,既不是他个人的“偏好”,更不是他个人的“编造”,而是根源于哲学所把握的时代——现实被“抽象”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不是远离了时代,而是以“抽象”的哲学表征了受“抽象”统治的现实。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时代内涵”,也是黑格尔哲学以理论的方式洞察和把握时代的“思想力”。

黑格尔以“抽象”的哲学表征了受“抽象”统治的时代,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自觉到他的“抽象”的哲学“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并没有本质地揭示出真正的“时代内涵”。与此相反,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历史”出发,深切地揭示了“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以“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现实的人”就是受“资本”支配的人,“现实的历史”就是受“资本”支配的历史,“人的存在”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受“抽象”(资本)统治的时代。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的历史”的最深刻的“时代内涵”,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透视和揭示资本主义时代本质的最深刻的“思想力”。

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它不仅理论地表征了自己的时代,而且理论地表现着哲

学家对时代的不同理解和要求。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黑格尔的哲学使命是以“普遍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奠基,因此只能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人的“最现实”的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而不是致力于把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与此相反,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仅致力于揭示个人受“抽象”(资本)统治的现实,而且要求把个人从“抽象”(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的伟大的“思想力”。

哲学思想的“内涵逻辑”

哲学思想的文明内涵和时代内涵,实现于哲学的逻辑化的概念发展体系之中,实现于哲学理论的“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之中,实现于哲学的“内涵逻辑”之中。哲学的思想力,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它的理论的逻辑力量、理论的说服力量、撞击人的理论思维的征服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⑥以理论的彻底性为内容的逻辑力量,是哲学思想力的最为直接和最为现实的生动体现。

哲学思想的逻辑力量,是一种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思想力量。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重大的哲学问题。哲学以其逻辑化的概念体系去观照现实,才能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志的主观性,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反观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把现实升华为“思想中所能把握到的时代”。用现实活化哲学的概念体系,又用活化了的哲学概念体系去照亮现实,既生动地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力量源泉,又深刻地实现了哲学理论的思想力量。马克思在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首先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又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多样性的统一”和“许多规定的综合”以《资本论》的概念发展体系再现出来。

这个以理论的方式“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发展体系,就是马克思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就是《资本论》所照亮的“现实的历史”。哲学洞察和把握时代的思想力,在《资本论》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中生动地展现出来。

哲学思想的逻辑力量,不仅深刻地体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之中,而且更为深刻地体现在它以“术语的革命”而实现观念变革的理念创新之中。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⑦。“术语的革命”,是赋予“术语”以具有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内涵,是赋予概念、范畴以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内容,是实现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因而是改变人的基本观念的思想力量。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以“商品”“货币”“资本”等“术语”去描述“物和物的关系”,而是从这些“物和物的关系”中去揭示“人和人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真正的“术语的革命”,赋予这些“术语”以具有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内涵,实现了具有真正的革命性的观念变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的二重性而探究“劳动”的二重性,又以“劳动”的二重性而深究“商品”的二重性;从作为“特殊的商品”的“货币”的二重性而探究“作为资本的货币”,又以“作为资本的货币”而深究“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实现了“商品”“货币”“资本”的“术语革命”,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进而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逻辑”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资本论》的“术语革命”及其内蕴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照亮现实的强大的思想力。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发生质的飞跃的“我们的时代”,正在形成以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的时代特征。在“我们的时代”,“发展”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的核心理念,“信息”已经成为“后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对话”已经成为“后哲学文化”的基本方式。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我们的时代”,哲学正在形成源于我们时代的“术语的革命”,赋予“哲学”及其基本范畴以新

的时代内涵,展现了哲学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的思想力。

在“我们的时代”,哲学的“术语革命”,比较深刻地体现在:对于“哲学”,我们不仅将其视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也不仅将其视为“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且将其视为“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因而致力于以“哲学”的理念创新而变革人的“现实自我意识”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对于哲学的“世界观”,我们不仅将其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而且将其视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既肯定其时代性的绝对性,又承认其历史性的相对性,因而致力于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观变革”,不断地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哲学的思想解放;对于哲学的“反思”,我们不仅将其视为“对思想的思想”,而且将其视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在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方式、基本逻辑、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中,开拓当代哲学的无限开阔的思想空间;对于哲学所指向的“本体”,我们不仅将其视为“世界的本原”,而且将其视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标准和尺度”,从“标准”与“选择”的实践观点去看待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为构建当代人类的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本”,从而超越“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和“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对于哲学所提出的“理念”,我们不仅将其视为哲学家们的各异其是的“基本观念”,而且将其视为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所形成的“关于时代的真理”,既从其“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去透视哲学思想中的时代,又从其“广泛而深刻的矛盾性”去洞察时代的重大问题和 development 趋向,进而以哲学的理念创新去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表明,仅就对“哲学”自身的理解说,切实地推进关于“哲学”及其“世界观”“反思”“本体”“理念”的“术语的革命”,就会赋予“哲学”及其基本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因此展现“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思想力量。

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的“活的灵魂”,就是在对既有文明的“肯定的理解中”,又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就是不仅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由此构成的就是哲学“范畴文明”的思想力。

哲学“范畴文明”具有双重含义:其一,哲学以自己的“范畴”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从而构成“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其二,哲学以自己的“范畴”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从而构成“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范畴文明”的双重含义,深刻地体现了哲学是在对文明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

哲学对既有文明的“否定的理解”,实现于“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每个时代的文明,都有构成其文明形态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都有其规范文明形态的时代内涵。马克思把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从人的历史形态上确认为“人的依赖关系”,并从其文化内涵上确认为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又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从人的历史形态上确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从其文化内涵上确认为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同时揭示其所构成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还从“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现实的历史”出发,提出了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以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为引导,超越“资本的逻辑”,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对“文明形态”的“前提批判”,既显示了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又构成了“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哲学对既有文明的否定的理解,集中地体现在对“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哲学的“关于时代的真理”——的前提批判。在揭示和论证哲学史之所以是“发展史”时,黑格尔就提出:哲学史上的每一种哲学所提出的“每一原则在一定时

间内都曾经是主导原则”,因此,“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⑧。黑格尔对哲学“发展史”的理解,深切地揭示了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二重性”:其一,每一种哲学“原则”作为“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核心理念,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不仅需要对其“肯定的理解”,而且必须将其作为“环节”而“保存”在“思想性的历史”之中;其二,每一种哲学“原则”作为“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核心理念,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而不仅需要对其“否定的理解”,而且必须“推翻”其“原则”的绝对性,以新的哲学“原则”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诉诸哲学史,从哲学所表征的“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再到“思想体系的时代”和“分析的时代”,每个时代的哲学“原则”都既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又蕴含了其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推翻”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原则”,创立了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新世界观——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以“人的历史形态”作为理论内涵、以“现实的历史”作为反思对象、以“历史的辩证法”作为批判武器、以“人类解放”作为价值诉求的“现代唯物主义”。

哲学对既有文明的否定的理解,深刻地体现了哲学“清理地基”的批判精神。人类文明的不同时代,各有构成其自身的根据、评价其自身的标准和规范其自身的尺度,这是各种文明“大厦”得以构建的“地基”。哲学的批判,就是批判地反思作为文明“地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它追究生活信念的准则,探寻存在方式的根据,讯问真善美的标准,反思文明进步的尺度,它反对人们对既定的世界图景、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和僵化的哲学理念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不证自明”“天经地义”“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它启迪人们以更高的合理性、目的性和理想性去反思自己时代的文明,把现实变成更为理想的现实。这就是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的“思想力”。

“清理地基”的哲学并不是对文明的徒然的

否定,而是对文明的创造性的塑造和引导。哲学的“创造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家从新的视野、以新的方法、用新的综合为人类展现新的文明。因此,哲学的创造性的“思想力”,就是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人类文明,揭示既有文明的内在否定性;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去检讨时代性的哲学理念,揭示已有哲学理念的内在否定性;在对既有文明和既定理念的双重批判中,以新的哲学理念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实现和推进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范畴文明”的哲学的最为根本的“思想力”。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 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11页。
-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 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41页。

作者简介:孙正聿,1946年生,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冯 潇)

王安石两首“众乐亭”诗考

徐 涛

王安石有两首咏“众乐亭”诗,分别是《明州钱君倚众乐亭》和《寄题众乐亭》。今人多据诗题中的“众乐亭”而将二诗定为一时所作,其实这两个“众乐亭”并非一回事。

《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为王安石称赞钱公辅(字君倚)嘉祐六年(1061)在明州修众乐亭而作(参见刘成国《读〈王荆公诗注补笺〉献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0页),当时钱公辅、司马光、邵必、吴中复等人皆有题咏,《延祐四明志》卷二〇中《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29、6432~6434页)收诸人之作,包括《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但《寄题众乐亭》却不在其列,说明后者所咏并非明州“众乐亭”,故《延祐四明志》不收。

通过细读可进一步发现这两首诗的差异。首先,《明州钱君倚众乐亭》是赠明州知州钱公辅的,故诗云“使君幕府开东部”;而《寄题众乐亭》是寄给一位县令的,故诗云“令思民事”“夺令去”“令知道义”。其次,明州“众乐亭”是一座湖中水亭,邵亢《众乐亭记》记钱公辅之言曰:“我乐与众人之乐而申之,为之亭于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众乐’名焉。”(《全宋文》卷一〇三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78页)故《明州钱君倚众乐亭》诗云“扫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随指顾”;而《寄题众乐亭》诗中的“众乐亭”则是一座山亭,故诗云“千峰秀出百里外,忽于其上耸檐楹。”由此可证,两个“众乐亭”其实并无关涉,只是名称偶同而已。

那么《寄题众乐亭》中的“众乐亭”在哪里呢?王安石好友王令集中有《寄题宣州太平县众乐亭》(《王令集》卷

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诗,其中的“宣州太平县众乐亭”,应当就是王安石《寄题众乐亭》诗中的“众乐亭”。证据如下:其一,王安石诗首二句云“陵阳游观吾所好,恨不即过众乐亭”,可见此“众乐亭”在“陵阳”,亦即宣州。其二,王令诗云“亭前行迹不破草,亭下野鸟常喧啾。山云朝嘘翠巘出,海月夜下清溪浮”,显然描写的是一座山亭,与王安石诗对“众乐亭”的描写相合。其三,王令诗题下有小注云“为孙莘老作。”孙莘老即孙觉,清嘉庆《太平县志》卷九载孙觉本人《众乐亭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册,第229页)曰“余令太平之年,得县之东山溪之会处以作亭焉,而至者乐之,因名之曰‘众乐’,又得其所以乐者,为之记以自览。嘉祐三年六月,守县令孙觉记。”可见宣州太平县“众乐亭”是孙觉任县令时所作,故王令诗云“令君架亭乐幽荒。”此正与王安石《寄题众乐亭》诗的寄赠对象相合。李壁注王安石《别孙莘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诗云“介甫后自群牧出宪江东,莘老时犹在太平。公集有《与莘老》一书,论朋友切磨及盐秤子事,亦可见二公情分始末未尝不同。”可见孙觉任太平县令时已与王安石交好。

通过以上论证可知:王安石《明州钱君倚众乐亭》诗是题咏明州知府钱公辅修建的“众乐亭”,作于嘉祐六年;而《寄题众乐亭》诗则是题咏宣州太平县令孙觉修建的“众乐亭”,作于嘉祐三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